

崇安文史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无锡市崇安区委员会

崇安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崇安文史》第三辑编辑人员

主 编：杨惠英

编 辑：朱寿泉 叶家本 吴顺清

朱协青 华通源

校 对：诸茹英 殷月琴

目 录

周山浜地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初期所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陶克华 (1)

高文华烈士传略……………高福珍、陈忱白、汤锡璋 (5)

平凡的一生，博大的情怀……

——缅怀母亲朱秉清烈士……………夏方志 (11)

锡城筹义举，沪上悼忠魂

——记张达生、朱大同、王文忠三烈士……………丁亚萍 (17)

抗战胜利纪念塔建立纪实……………丁亚萍 (24)

工贸合营无锡童装厂沿革史……………丁蓉蓉 (26)

发展中的崇安人民医院……………方鹤卿 (30)

崇安医院蛇科春秋……………陈立己 (34)

崇安人民医院口腔病分院发展概况……………朱俊达 (37)

求实奋进的崇安职工学校……………潘必成 (41)

中华圣公会无锡圣十字堂简史……………唐子良 (44)

重温乡味——忆崇安寺皇亭小吃……………吴伟勋 (48)

冶坊场的今昔……………陈良璋、诸茹英 (55)

门墙桃李满海外的针灸专家杜晓山……………**张奇昌** (58)

伤骨科主治医师丁祥发……………殷月琴 (62)

忠诚教育，辛勤耕耘——记优秀教师杨瑞贞…汤锡璋 (64)

悉心钻研一题多解，积极开拓学生思维

——记著名数学教师周云起……………**张奇昌** (68)

德风遗范——陆贯一先生生平事迹……………张飞龙 (72)

旧迹映山河与侯氏亦园·····	侯镜莹 (75)
回忆解放前的复兴路·····	赵蔼士 (78)
克堡桥·····	王千里 (80)
巷名小考·····	侯镜莹 (82)
旧城区地名歌谣一则·····	侯镜莹 (84)
保卫乡土的英雄何五路·····	侯镜莹 (86)
城隍庙匾额·····	张静仪 (88)
毁新城隍·····	张静仪 (91)
南有飞泉北有山 (外二首) ·····	张寿平 (94)

周山浜地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初期所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

陶克华

早在六、七十年以前，周山浜一带已开始成为无锡的工厂稠密区，纱厂、布厂、丝厂、翻砂厂和机器厂星罗棋布。鳞次栉比的厂房间矗立着高矮不一的烟囱，工厂周围是工人住的简陋工房。随着工厂的增多和工人队伍的扩大，该区成为无锡革命斗争史上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共江苏省委早期负责人王若飞、陈云等人都曾到过此地。本文介绍的仅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发生在周山浜一带的几起重要事件。

惠农桥73号工房事件

惠农桥73号工房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会秘密机关所在地。1927年秋，中共无锡县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省委农民运动计划，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县委要求地下工会秘密组建工人赤卫队，策应乡村的农民暴动。县委代书记王津民同志亲自负责这项工作。王津民以惠农桥73号工房为据点，以铜铁机器翻砂联合工会（简称机器工会）为骨干力量，组建工人赤卫队。组建过程中，不慎走露风声，被国民党县党部的“鹰犬”——县总工会察觉，于10月23日晚向国民党县公安局代局长宋静庭密报。宋得报后大吃一惊，即派警察教练杨仞千率20余名巡士开往周山浜，会同该区公安二分局一支局警察队，包围惠农桥73号工房。此时已是晚上

8 时许，王津民等 10 余人正在室内开会，发现外面有动静就立即分散突围。其中，机器工会副委员长、中共党员周荣葵等少数人在夜幕掩护下安全脱险，而王津民等 6 人当场被捕。警察还搜出县委的农民暴动计划方案、在锡国民党军警商团驻地和装备调查表、花名册及大批传单。宋静庭如获至宝，连夜审讯。次日，设在城内观前街 20 号的县委机关和书院弄严氏试馆内的县委联络站也均遭搜查，幸已事前转移，所遭损失不大。11 月 13 日，被东北乡农民暴动吓得惊恐失措的国民党地方当局未按正常法律程序，便匆忙在南校场（现市七中附近）处决了王津民等 7 人（其中 3 人在惠农桥事件中被捕），并惨无人道地将烈士首级分悬於各城门口及火车站等地“示众”。王津民等烈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无锡牺牲的第一批共产党员。那位“破案”有功的县公安局代局长宋静庭则以血染顶，“荣升”为正局长。

汤家桥事件

1927 年 11 月发生的无锡农民暴动失败以后，中共县委按照中共省委指示继续准备再次暴动。1928 年初，中共省委军事科在无锡周山浜设立的联络站遭到破坏。3 月下旬，无锡党、团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分别在东北乡和西乡开展武装斗争。为加强两地联络，共青团县委在周山浜汤家桥（火车站附近）李姓家建立秘密机关，又在广勤路小菜场辛字 3 号工房、织字 6 号工房等处设立联络站，开展地下活动。这些机构刚成立 3 天，即在 3 月 26 日就遭破坏。带领国民党警察在周山浜工厂区进行大搜捕的仍是杨仞千。团县委领导人张兰舫、高文华等 6 人被捕，并被抄出大量党、团组织的秘密文件（暗夹在马可福音等宗教书籍中的）。张、高等人作

为“要犯”被押解南京审讯。后高文华牺牲於南京狱中。

顺兴里事件

1929年冬，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省委派管文蔚任中共无锡县委书记。管文蔚到锡后就在周山浜顺兴里设立县委机关，积极地在周山浜地区工厂和附近国民党驻军中开展工人运动和士兵运动，先后在一些工厂及驻军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翌年3月，管文蔚向来锡巡视的省委外县委书记陈云汇报了士兵工作情况以后，省委即派出特派员到锡从事策反工作，不慎中敌奸计，省委特派员及部分县委委员（共7人）在周山浜地区的上海旅馆内接头时被捕。以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加强了对周山浜工厂区的监视。4月9日凌晨，国民党县公安局警察大队长朱振国率领警士化装成工人模样，冒着瓢泼大雨，突然袭击顺兴里县委机关驻地，破坏了县委机关，接着又破坏了位于光复门外中正路21号的团县委机关。国民党省党部闻讯后，立即派员专程赴锡调查此案，国民党省政府亦下令将“要犯”押往镇江审讯。无锡的党、团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丝厂工人总罢工事件

1930年上半年，无锡丝厂业因国外丝市好转、丝价回升而出现了复苏迹象，但是，丝厂工人的生活却因物价上涨而日趋贫困。这样，广大丝厂工人要求修改劳资协约、增加工资的呼声日益高涨。7月18日，周山浜地区的万益、源丰、乾丰、瑞昌、德大裕等丝厂女工先后罢工，遭国民党警察大队的武装镇压。10月初，全无锡丝厂停业三分之一，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并且资本家借口丝业危机，八折发放工人工资，引起丝厂业劳资矛盾严重激化。12月2日下

午，周山浜一带的瑞昌、乾丰等丝厂女工忍无可忍，率先发动罢工，一小时之内波及全无锡，酿成无锡历史上第二次丝厂工人总同盟罢工。以周山浜地区丝厂工人为主力的丝厂工人总罢工在整个苏南引起震动，省委、全国总工会派出省委常委刘瑞龙等人专程到无锡指导斗争。县委常委会议决定以周山浜工厂区为重点，发动工人斗争。县委书记吴国治和城区区委书记冯金妹两人以工人互济团名义在周山浜丝厂区从事宣传、发动工作。国民党当局也将周山浜作为重点区，连日调动武装警察去周山浜各丝厂镇压，并指使黄色工会成员在工人群众中游说，软硬兼施强迫工人复工。吴国治和冯金妹在周山浜一丝厂门口向工人宣传鼓动时，当场被捕。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高压政策下，周山浜一带的丝厂被迫复工，全县丝厂工人总罢工遂告失败。这次总罢工历时5天，在全无锡工人中造成了很大影响。



高文华烈士传略

高福珍·陈忱白·汤锡璋

高文华烈士，江苏无锡人，1908年出生于岸桥弄25号。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牺牲于南京国民党江苏第一监狱，时年23岁。

高文华祖父高旭如是位私塾先生，父亲高辅臣体弱多病。虽然家庭生活拮据，但是家里的藏书却很多，高文华少年时代有许多时光是在书箱旁度过的。高家引以为骄傲的是祖先高攀龙，文华经常从父辈那里听到有关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奸党斗争的故事。

1922年，高文华毕业于锡师附小七年制小学，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他一面读书，一面在书店当学徒。在附中的两年中，他接触了具有革命思想的教师和同学，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急切地探求真理。1924年7月，16岁的高文华与一批同学跨上南行的列车，奔向广州。当年冬天，进了黄埔军校。1925年加入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担任某连党代表，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

在黄埔军校时，高文华的父亲托人在山东胶济铁路局给他找到一份工作，月薪60元。在当时，铁路上的职业是个“打不碎”的“铁饭碗”，父亲写信催他去山东就职，早点成家立业。文华回信断然表示：“山东有六百元、六千元一月的事，我都不做。我要做的是使天下穷苦人将来都吃饱穿暖的事情。”1926年7月，北伐开始，高文华先后任西

北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六十七军第九师第二旅中校参谋、总司令部工兵团党代表兼宣传部长（上校）等职务。在这期间，蒋介石对高文华表示了特别的关照，曾以“图书费”名义专拨五百银洋给高文华所在部队，供他支配。白崇禧也主动与高文华接近。然而，蒋介石日渐露出了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高文华联络同志，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叛变行为，使蒋十分难堪。不久，高文华于1927年初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扣押于江西东路指挥部，后经党组织设法营救而获释。之后，党组织考虑他不能再留在军队，便派他来沪宁一带工作。

1927年3月，高文华回到了无锡岸桥弄家中，家中人几乎不认识他了。只见他穿着件破旧的长衫，袖上缀着补丁，一双单鞋破旧不堪，面孔瘦削，两只眼睛显得格外深邃。后来他在狱中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曾回忆说：“你看我前年在家时，一件破旧的长衫，鞋袜都破旧不堪，……无论到那里都是步行，……这样才纯洁，才高尚，才可真正的不要钱，若自己的生活奢华了，那奢华的生活成为习惯时，就很需要多一些钱钞的时候，就不能不做卑污的行为了。”

高回家不久，就进《中山日报》社当编辑，按照党的指示，他用手中的笔，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高文华很忙，经常边吃饭边看稿、改稿。《中山日报》上常刊登一些揭露土豪劣绅反动嘴脸的文章。一次集会上，一位劣绅对他说：“老兄，你那支笔骂人骂得好厉害呀！”他正色回答说：“我不过说真话，写实情罢了，怎么能算是骂人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屠杀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4日，无锡的反动派也制造了大雄宝殿血案，党的优秀儿子——秦起同志壮烈牺牲。于是，党的工作转入

地下。当时，由于高文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敌人没摸清他的底细，他仍然进行公开斗争。他经常从设在堵家弄里的党的秘密机关接受指示，起草、散发革命传单。11月，东北乡暴动失败，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乔沁泉同志牺牲，经共青团省委决定，由高文华继任乔沁泉的工作。不久，他发现敌人跟踪，经请示组织同意，转入农村，化名程清，在洛社北面的端楷桥小学建立据点，在锡西的杨墅园、藕塘桥、张泾桥、严家桥及市区等地秘密发展团员，壮大组织力量。各乡村的农会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出来，农民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地主们恐慌万状，妄图依仗反动武装，维持昔日的“威风”，尤其安镇的地主武装更为猖獗。3月初，县委决定，必须以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拔掉安镇这个反革命据点。为了商定具体方案，3月27日清晨，高文华和农会的张兰舫化装成菜农模样，各挑一担新鲜蔬菜，来到周山浜汤家桥庆丰纱厂工人朱菊生的家里。正当团县委干部及骨干分子在阁楼上开会时，敌人突然包围了这幢破旧的平房。高文华一面冷静地指挥大家突围，一面销毁了文件。敌人是早有预谋的，高文华、张兰舫、朱菊生等同志不幸被捕。

当天晚上，高文华等被绑在国民党县政府院子里的树上。伪警察局长丁用翰见抓到了高文华，得意非凡，心想高是县团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全县共青团员的名单不都在他那里吗？丁用翰曾与高文华在黄埔军校同学，他梦想以同学的关系和高官厚禄来打动高文华。但不管甜言蜜语，还是灌辣椒水和上老虎凳，高文华始终只有一句话：“要头有，要名单没有！”丁用翰气急败坏地把高文华的母亲找来，要她劝儿子把名单交出来，否则高文华性命难保。高母深明大义，怒斥丁用翰说：“亏你想得出！儿子是我生的，我知道他的脾

气。名单的事，我劝也没有用。”丁用翰竟进一步威胁说：

“你当心点，你还有女儿！她给高文华的信还捏在我手里！”

在坚强的共产党人面前，敌人黔驴技穷，什么也没有得到。6月，《新无锡》报上报导了程清（即高文华）等31人解送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消息，说：“此31人或系奉令缉拿，或曾搜获证据嫌疑至重，然皆屡诋而无口供。”解送那天，文华母亲赶到火车站，只见文华等戴着镣铐在大街从容走来，气宇轩昂，目光炯炯，他坦然地向母亲道了声“放心”，就上了火车。

国民党南京特刑庭以所谓“参与共产党，危害国家”的罪名判处高文华九年徒刑。判决后，特刑庭审判官孙祖基问高文华服不服？高文华厉声诘责：“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江山能不能坐稳九年？”

1928年7月，高文华被敌人关押在江苏省第一监狱。这是一个活的地狱，反动派妄图用它来缓慢地折磨摧残革命者。高文华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354号的号码，同五个难友同囚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牢房里。牢房没有窗户，只有一个碗大的圆洞，终日不见阳光，牢房的角落处放着粪桶，臭气四溢。他关进去时正值夏天，蚊子、臭虫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每天只有两顿饭，一顿只有两个又霉又烂的饭团。一个月洗一次澡，一千多名难友在不到一丈见方的池塘里，只能用泥浆水抹一抹身子。狱吏们个个如魔鬼，动辄就是皮鞭抽，拳打脚踢是常事，甚至用老虎凳、灌大粪等酷刑，但这些，只能吓唬一些软骨头，而压不倒钢铁般的战士。高文华在狱中磨炼得更加坚强，他乐观地坚信着革命的未来，并为它顽强斗争和勤奋学习。他在给妹妹的一封信中说：

“这九年，可以专心读书，以求人生及社会各方面必需之学问和知识……”同时，他热情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啊！森林里起了星星之火，山野里起了星星之火，平原里起了星星之火，水边上起了星星之火。……水边之火接着平原之火，平原之火接着水边之火。全世界的火光衔接了，全世界都着了火了……”

1929年7月，监狱中的一千多名难友在狱中党支部发动下，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抗议典狱长钮傅崎克扣粮食。经狱中党支部决定，由高文华起草了一个“呈文”。尽管这呈文送国民党政府后如石投大海，但通过互济会送给进步报刊的抄本却在社会上公布了。罪恶的黑幕被揭露，国民党当局狼狈、震恐，气恼异常，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又不得不假惺惺地“派员彻查”，事后，伙食略有改善。复食的当天晚上，高文华被提解到二科科长史兆元的办公室。史兆元饿狼似地抓住高文华的手，用一根粗棍拼命地敲打，嚎叫着说：“我叫你写，我叫你写！”高文华痛裂心肺，但他咬紧牙关，一字一字地说：“你打得烂我的手，但打不烂我的心，我还是要写的！”隔了不久，难友胡小狗在病监中由于呼痛搅乱了狱吏的好梦，被虐打致死。为此，狱中党支部又发起了一次斗争，控诉书仍由高文华执笔。

高文华在狱中除了直接向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外，还用文艺的武器向反动统治者战斗。他在给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

“文艺过去是深山隐寺的，现在是十字街头的了。过去大部分是写给少爷小姐看的，现在却是一种武器了。我愿用这样的枪炮子弹继续战斗。”接着，他寄回家好几首诗。

高文华虽在狱中，却十分关心外面的革命斗争，怀念着同甘共苦的战友。当他得悉另一团县委委员薛光楣在江阴被

害时，万分悲痛，写信要妹妹帮助搜集薛光楣同志的斗争事迹，准备为他写传记。

高文华除了自己坚持斗争、勤奋学习外，还不断写信鼓励、教导他的妹妹要用功读书，多看报、多看杂志，要她阅读《资本论》、《唯物史观》、《新经济大纲》等，并多做文章，不要错过青春韶华。他向妹妹说：“世界上有一个较好环境在等待着我们”，“与其在污秽的世界上求生，倒不如轰轰烈烈的死”。他还启发妹妹：“一个人觉悟了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有什么力量来解放自己呢？因此，一定要团结起来，组成团体。”

1931年3月，也就是高文华牺牲前四个月，他把一张在狱中拍的照片寄给家中，照片旁题了一首诗代替家书，上面写道：“他快活着，如象从前。他毫不忧愁，为的他全无挂牵。”这首诗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7月，南京发大水，监狱里污水没膝，伤寒蔓延。三年多的牢狱生活，高文华的身体早已受尽摧残，终于敌不住伤寒的侵袭而病倒了。狱吏们巴不得这个“眼中钉”早死早好，所以既不给他治疗，也不通知他家属。7月16日，高文华把自己的一些书和母亲探望时送去的一点食品分送给难友们，仅留一本《共产党宣言》放在枕边。他握着侯连赢等难友的手说：“我不行了，希望你们努力奋斗，反动派终究是会灭亡的。”当天晚上，这位党的优秀儿子，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坚贞不屈地牺牲于狱中。

烈士的青春永驻，
烈士的精神长存！

（此文根据烈士的妹妹高福珍、战友
陈忱白等回忆和烈士的遗书整理而成）

平凡的一生 博大的情怀

——缅怀母亲朱秉清烈士

夏方志

在无锡烈士陵园中，安葬着一位平凡的战士、我的母亲——朱秉清烈士。

母亲朱秉清，江苏涟水人，一九〇一年生，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她那坚强乐观的革命精神，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印在她生前战友的脑海中。因为她排行第二，所以，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二姐”。与母亲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多已离开人世，现在健在的也都在80岁以上，他们遇故人，叙往事，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二姐，赞扬二姐的崇高革命品德，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同志的极端热忱。

冲破黑暗导真理

母亲幼年，外祖母就去世了，寄居在其姑母家。没有上学的机会，后经刻苦自学，能看一般书籍和报纸。

结婚数年后，不幸的遭遇接踵而来，丈夫病故，孩子夭折，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平时，经常受到“寡妇命毒”的讽刺，还有人企图夺取她的家产……。母亲虽然痛苦，但并不屈服，她深深地思索着：妇女为什么会受歧视？她勇敢地接近一些进步青年，阅读能找到的进步书籍。有本法国进步小说《马利龙夫人传》对她很有启发。她想，外国女人能革命，中国女人为什么不能革命，由此，“革命”二字就在她思想上萌发了。

一九二六年，她在上海参加了革命，活动在“法租界”一带，后因吐血而转移到浦东，大革命失败后又回到涟水。

“七·七”事变后，涟水人民抗日救亡力量日益壮大，各种抗日组织相继建立，国民党也成立了“妇女抗日动员委员会”，我方动员马树模、张鸿志等同志参加这个组织，以取得合法地位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为了在农村开展抗日串联工作，需有一个落脚点，组织上便来找我母亲（我母亲已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要将张鸿志同志安排在她家中。她一见面先问张鸿志怕不怕苦，怕不怕杀头？听了张鸿志同志肯定的回答，她便高兴地说：“那好，你住在这里，我和你们一道工作。”自此，母亲家成了地下活动的联络点和同志们的落脚点。

倾家捐资为人民

民主政权建立前，各地抗日活动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各尽所能，支持抗日。母亲的住处正好在几个抗日基地的中心，自然形成联络中心点。只要是抗日所需，她都给予大力支持。一九三八年五、六月份，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创办的《消息报》就设在她家，一切经费都由母亲承担。过往的同志来到她家，她都热情接待。有的同志把亲属放在母亲家，日常生活都由母亲安排和照顾；有的女同志生孩子住在她家，她就帮着缝洗；有的同志身体不好，到她家休养，她都亲如手足，悉心照料，还帮助寻医找药；有的同志们缺衣少被，她就把自己盖的被，身上穿的衣服脱下给同志。在游击环境中，卫生条件差，很多同志身上生了虱子，她总是督促大家把衣服换下来，让她用开水烫洗。有些同志不好意思，她就以老大姐的口吻强迫他脱下来。

深夜，她总是在小油灯下为同志们补衣服。有一次，高兴泰、戴曦等同志从苏皖边区特委来涟水工作，没有替换衣衫，她上街买布做。寒冬腊月，同志一进她家门，她总是问寒问暖，捧把草生火给同志烘烘暖。这那是一把火啊？这是一颗火热的心烘暖着同志们的心啊！有的同志外出缺少路费，她总是设法解决。就是不需费用，她也主动地煮些鸡蛋塞在他们的衣袋里。总之，只要革命需要，她有求必应，有难必解，处处为同志们着想，所以，同志们把我当作家作革命的大家庭。

母亲家原有百十亩土地，由群众代耕，产量并不高，所收粮食有限，遇到贫雇农有特殊困难，她还要帮助解决，因此，除了各种开支所剩无几。为了支持抗日，没有钱她就卖地、卖家产。当时有同志谈到她卖地的事，她坦然地说“自己无力耕种，总不能去剥削别人，国难当头，卖了它支持抗日，为人民做点好事是应该的。”

经济越来越困难，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瘦弱，但她一天到晚仍是乐呵呵地跑里跑外。同志们看到她那瘦弱的身躯，心疼地说：“二姐，你自己要注意身体啊！不能光顾我们。”她总是笑笑回答：“没什么，只要你们吃饱睡好，再苦再累我心甘情愿。”这对同志们是多大的鼓舞和激励啊！

爱憎分明立场坚

抗战初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母亲在党的教育下，对敌我友分得清，看得准。她善于团结劳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不仅自己经常到贫雇农家去走门串户，还经常带着其他同志一道访贫问苦，宣传抗日。她常说：“贫雇农是革命依靠力量，我们要关心他们，和他们建立感情。”由于她和群众关系密切，人们常常主动参加巡逻、送信等，